

【书业研讨】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 合作网络结构与模式研究

陆蒙蒙 崔波

【摘要】基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中华学术外译历年立项公示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2019-2021年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机构合作网络的演化状况,为决策者有效优化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行动者主体结构提供依据。研究发现,越来越多机构加入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中,合作网络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传统社科类强势出版机构处于网络核心位置,在联合申报过程中发挥资源中介的作用。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3种典型的合作模式,分别为基于关系资本的邻近优势嫁接型合作模式、基于认知资本的学术资源整合型合作模式和基于结构资本的规范制度嵌入型合作模式,通过3种合作模式中的不同社会资本整合可以提升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合作效能。

【关键词】社科学术图书;出版走出去;合作网络;合作模式

【作者简介】陆蒙蒙,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崔波,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杭州310018)。

【原文出处】《出版科学》(武汉),2023.4.104~112

【基金项目】本文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数字版权贸易竞争力研究”(22NDQN259YB)、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社会资本视域下中国学术出版国际传播的价值共创机制研究”(2023QN05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数字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21&ZD322)资助。

1 引言

学术出版既是对本国前沿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组织呈现,也是各国创新能力的博弈与话语权竞争。学术交流的无国界属性使得学术出版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具有天然优势,事实上,学术出版走出去成为落实对其他国家形成知识、思想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中后期,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出版强国都设置专门的项目、专门的组织或者专门的出版基金来推广本国的学术图书^①。对照而言,我国也在持续推动中国文化和学术“走出去”,包括但不限于早期的《大中华文库》工程(1995)、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再到中华学术外译(2010)、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2014)等一系列项目^②。其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办公室于2010年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项目旨在深化全球学术交流与对话,扩大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截至2021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历年立项总数达1400余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设立10余年来,出版机构在翻译授权和对外输出途径方面的社会资本受到各界关注,项目申报方式等方面也越来越完善。

作为一个国家学术成果与全球学人对话的平台,学术出版在推动全球学术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媒介作用,已有研究对这一议题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但现有对学术出版走出去相关的研究更多将视角聚焦于科技期刊这一载体,而对于学术著作作为载体的学术出版走出去关注较少。此外,在研究问题上更关注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支持政策、提

升策略等描述性研究,而忽略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已有研究虽然已涉及对学术出版走出去行动者主体的重要性进行论述,但对行动者主体构成的合作网络及其结构演化等具体属性却无系统深入研究,不同类型主体在合作网络演化中发挥什么作用?合作网络结构在纵向的时间维度具有怎样的演变?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地优化配套政策支持体系对行动者主体的支撑匹配度,并对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行动者主体结构进行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便实现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结构性优化。

本研究选取的数据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中华学术外译历年立项公示栏目,由于2019年申报方式变化,变为个人作为项目主持人,出版社作为责任出版单位,两者分工共同完成项目。因此,本文以2019年为时间节点选取了2019-

2021年共3年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577项(2021年度235项,2020年度191项,2019年151项,不含期刊类)。一个社会网络是由多个节点和各个节点之间的连线组成的集合。本文关注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合作网络,因此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具有合作关系的出版机构和大学为节点,以共同承担一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连线构建机构合作网络。本文主要关注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的网络密度、中心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以及核心-边缘结构等指标,揭示合作网络的结构性特征。

2 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结构特征

以2019-2021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合作申请矩阵数据为数据源,通过UCINET软件构建机构合作网络,并使用NetDraw软件绘制可视化网络图,见图1-3。其中,圆形节点为社科学术图书合作网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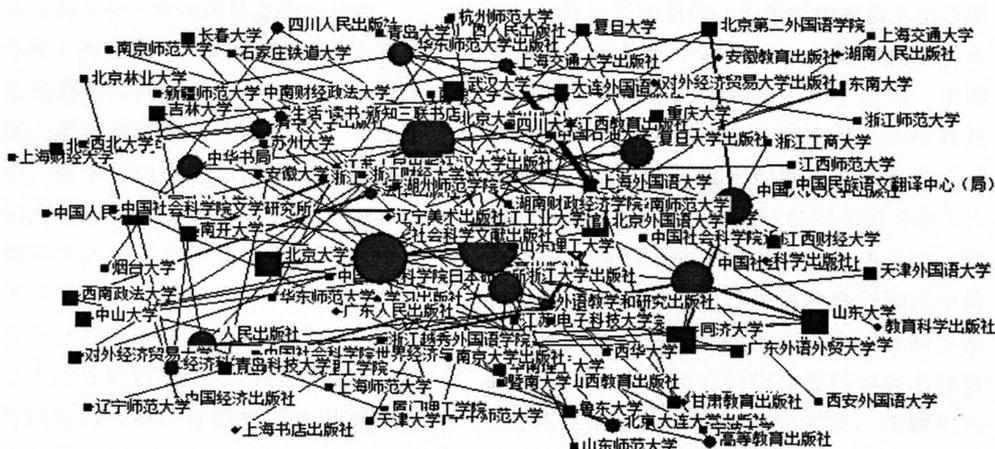


图1 2019年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机构合作网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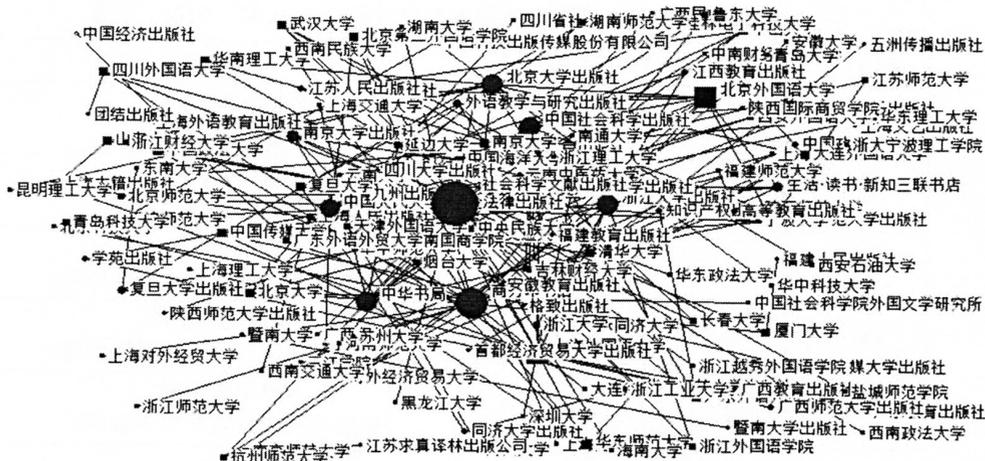


图2 2020年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机构合作网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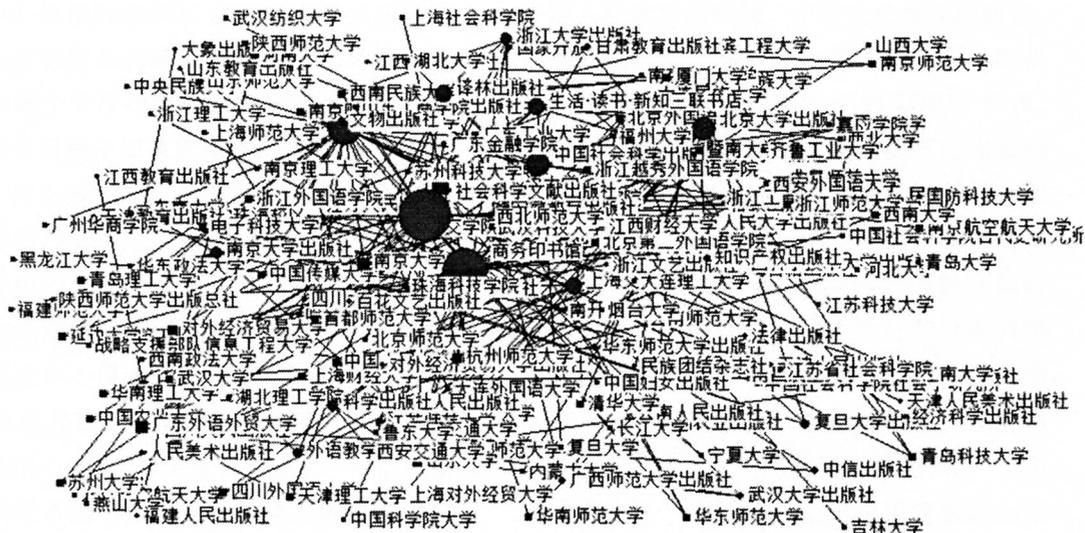


图3 2021年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机构合作网络图

的主要行动者主体——出版机构,方形节点为社科学术图书合作网络中的主要行动者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网络节点大小代表该节点的点度中心度,节点越大,与该节点相连接的行动者主体越多;连线粗细代表连接关系的数量,关系线条越粗,即两个节点之间合作承担中华外译项目越多。

2.1 整体结构分析:中心边缘型合作结构

结合表1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是一种接近中心边缘型的网络,即网络的度平均度较低,网络凝聚力较小。在中心边缘型网络中,节点及其联系遵循典型的二八法则,即少部分核心节点掌握网络中的大部分关系连接,而大部分节点仅掌握有限的少数连接。不同节点间的地位和权力分配差距较大,表明在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

过程中不同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的行动能力和资源分配处于不平衡的结构关系中,网络容易受到部分核心节点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核心出版机构的学术出版服务能力和海外竞争力下降,会影响整个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节点间的联系不紧密,网络结构相对松散且稳定性差。从2019年到2021年,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虽然吸纳了更多的行动者主体,网络规模有所扩大,但其网络凝聚力和度平均度指标变动微弱,整体而言,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仍然存在行动者主体多元性不足且垄断程度较高的现象,出版机构之间存在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可能性。

2.2 网络中心性分析:相对稳定的网络关键节点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要分析指标之一,

表1 2019—2021年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结构特征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网络规模 (网络中节点数量)	118	142	176
网络关系 (网络中节点联系的数量)	132	174	223
网络密度 (网络中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0.01	0.009	0.007
网络凝聚力 (整体网络对核心节点的依赖程度)	0.094	0.162	0.165
网络度平均度 (网络中各节点直接关联程度)	1.119	1.225	1.267

表2 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度中心度TOP10出版机构(2019-2021)

序号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出版机构	度中心度	出版机构	度中心度	出版机构	度中心度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1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7
2	商务印书馆	14	商务印书馆	19	商务印书馆	28
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	中华书局	20
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	浙江大学出版社	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18
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0	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
6	复旦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
7	人民出版社	6	南京大学出版社	7	泽林出版社	11
8	中华书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5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
9	清华大学出版社	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8
10	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南京大学出版社	7

能够帮助判断网络中的节点属性。当网络中某个节点的中心性较高时即意味着该节点在网络中拥有更高“权力”，处于重要位置。对于中心性的测量一般可用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等指标来进行。其中，度中心度指的是与某节点有直接合作关系的节点数量，连接的节点数量越大，该节点的度中心度越高，该节点在网络中的社会地位也越高。综合2019-2021年合作网络中度中心度TOP10的节点数据，可以观察到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的关键节点即高度中心度的节点波动较小，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华书局7家出版机构连续3年都是合作网络中的TOP10节点。从出版社属性来看，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三类主力军：依托高等院校的大学出版社（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隶属于国家科研机构的出版社（如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具有深厚学术出版传统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是网络中的核心节点，这与已有研究中提出的“‘中华学术外译’出版物，应当由国家级的出版机构联合国外有影响力的重要出版机构共同出版”观点相印证^③。尽管这些关键节点在中国社科

学术图书走出去过程中拥有国际合作出版与版权输出经验，相较而言拥有显著的社会资本优势，但从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行动者主体多元性而言，目前进入国家主要资助项目计划的地方性出版机构是明显缺失的。

3 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模式分析

在理解与解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合作行为时，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视角。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行动者主体可获取和使用的实际和潜在的资源总和，一般可分为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④。对于长期依赖国家政策资源输入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尤其是学术出版走出去，在制度框架下发掘自发的团队合作模式有利于整合游散的社会资本，提升行动者主体的实质性参与与内生性动力。社会资本整合对于提升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效能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社会资本所附着的信任和规范特征为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在一定的信任范围内，社会资本往往能通过以非正式协调替代正式制度的形式有效降低合作和交易成本。中华图书外译项目申报中2018年开始出现出版机构与个人联合申报的新现象，并在2019年作为新规给予制度化足以说明社会资本整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兼备学

术翻译能力和专业研究能力的学者个人与掌握版权资源和海外出版渠道的出版机构,彼此已经意识到“优势互补”的必要性^⑤。

3.1 基于关系资本的邻近优势嫁接型合作模式

关系资本指网络节点间以二元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形态,往往是社会资本积累的逻辑起点。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结构中,基于二元关系的合作结构是最为基础的合作模式,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基于亲情、友谊、地缘等特定关系属性类似,机构合作网络中基于关系资本的合作最初也多基于地理邻近性、内部系统一致性等产生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例如在中国社科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中,一种较为典型的合作模式是基于地缘的关系资本合作模式,这在项目申请人所在学校相对缺乏学科优势基础的优质资源时尤为明显,例如2019年一项获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所在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和本地出版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组成的合作模式,2021年获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齐鲁工业大学和山东美术出版社组成的合作模式,都是一种基于地域邻近优势的资本嫁接模式,通常集中在一些地方出版机构中。这类合作模式在整体中国社科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中是一种较为边缘的、短期的关系资本结合模式,难以扩展为更深入的认知资本与结构资本等相对更稳固的合作模式。这与其他学者提到的“一些有特色的地方性出版社没有竞争优势,宜从他们中选取一批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立项资助”^⑥的问题和建议是不谋而合的。在建构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立体的国际传播格局的大背景下,地方出版机构基于关系资本的合作模式理应受到制度化的平等对待甚至倾斜,在立足地方的前提下,在兼顾国家整体战略目标前提下,从地方视角出发,用地方叙事向世界讲述中国学术。

3.2 基于认知资本的学术资源整合型合作模式

认知资本侧重于强调群体范围内共享的解释、表达和意义系统,不同行动者主体的共同语言、共同经历和共享愿景是认知资本生成的重要细分维度。从结构上看,认知资本属于自我网络结构到整体网络结构过渡中的局域网络^⑦。认知资本是沟通交流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既有外文写作能力又熟悉相

关研究领域的学者是实现“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的关键主体。这其中,大学出版社拥有天然的关系资本优势,其与高校科研人员、学术翻译主体共享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能够促进二元关系外第三方主体的跨关系互动。在关系资本积累基础上逐渐生成认知资本,并发展出基于认知资本的在更广泛群体范围内的共享资源与愿景。例如大学出版社在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中的Top10节点中占据重要份额,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连续3年进入TOP10网络节点。以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为责任出版单位的中华外译项目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单位既覆盖本校研究人员,也包括浙江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地方院校,并且其翻译语言涵盖除英文外的俄文、蒙古文、西班牙文、韩文、斯瓦希里文等多元语种。这类合作模式是整体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中的中坚力量,能够跨越一定网络范围形成局域网络的联通与合作,形成更为稳定的局域性文化、规范和价值体系。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基于认知资本将自身积累的国际出版资源与国内外出版界共享,搭建“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邀请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共同形成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⑧。

3.3 基于结构资本的规范制度嵌入型合作模式

结构性嵌入将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关系分析上升到整体系统层面,结构资本强调网络中不同行动者主体的互动联系形成的结构关系。部分行动者主体可能处于连接不同群体的结构洞位置而享有接近信息优势,而位于网络中心位置的行动者利用结构位置在获取信息与资源的机会时也具有显著优势。例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深度嵌入在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其掌握的信息、资源、关系等优势能够转化为联通全网络的合作资本,使得在责任出版机构—高校科研人员联合申报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能够形成制度性规范,从而影响整体网络结构。在中国社科图书走出去的过程中,项目整体的流程把控、与海外出版机构的协调工作往往由对国际版权贸易、国际合作出版经验丰富的

出版机构负责,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在社科图书国际出版过程中积累的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嵌入性结构转化形成整合不同层次高校科研主体、连接不同类型出版机构的重要基础。例如,在外译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内出版机构起到了重要渠道建设和流程监管作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借助丰富的外译项目管理经验,会在每年度外译项目申报前,将最新出版书目信息推荐给各外方出版机构,签署出版协议或意向书,使得项目操作更为顺畅^⑨。当结构资本积累的程度使行动者主体占据网络核心位置时,往往会形成与外语类院校等具有翻译资源保障的高校机构的稳定合作关系,从而实现跨群落间不同资本的置换与黏合。例如,202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功合作获取4项中华图书外译项目,覆盖法文、英文、波斯文等语种。

4 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社会资本整合策略

4.1 关系资本整合:学术资源与翻译资源的连接

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需要对学术资源与翻译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而整合的路径往往依赖于出版机构编辑、作者以及译者等个体的关系资本。例如,有学者指出当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指定机构目录中的日方出版机构考虑到合同履行能力、预付出版经费等问题而拒绝翻译出版时^⑩,作者个人通过个人关系网络联系以出版学术著作见长的晃洋书房,最终促成了翻译出版计划。这类不在推荐目录内的机构,需要国内学者、译者既有的关系资本整合,使外方出版机构在面对翻译出版事宜中的谨慎保守态度得到缓解。又比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担心采用招标方式选择其著作海外译介的译者,难以保证译者学术素养及对所翻译著作的熟悉程度,导致译本质量不稳定,因此拒绝一家国内出版社的外译申请项目。他认为如果缺乏专业操作、不能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著作规范流程进行规划出版与后续落地,则“宁肯不出”^⑪。因此,在译者选择与对接的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作者个人的关系资本整合。此外,在整合学术资源的过程中,应当兼顾地方性院校与地方出版机构的资源对接。传统社科类强势出版机构以及大学出版机构在联合申报项目中从合作对象的协调沟通和资源整合等方面

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处于网络核心位置,但地方出版机构在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中处于弱势位置,尽管存在部分基于关系资本而达成的地缘性合作,但这种合作往往是非固定且难以拓展的,往往存在地方院校的相关学术资源、学者资源、翻译资源难以有效与地方出版机构对接的问题。地方出版机构在国际出版方面的政策鼓励与国际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推动地方出版机构优秀学术著作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拓展与现有网络中具有结构资本优势出版机构的合作。例如2021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有一本书《中国山水画史》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译林出版社3家单位联合申请立项,兼顾了地方出版社、语言类高校与具有翻译出版资源的出版社的资本优势。

4.2 认知资本整合:责任协调与利益分配的平衡

从2019年开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主体变为科研人员和国内出版机构两方,这在合作网络中形成了出版机构和科研单位的联合申报现实,尽管基于关系资本、认知资本和结构资本能够给予合作关系一定的规范性和互惠性,但涉及更为具体的资助经费分配等问题时,依然存在社会资本难以协调的责任困境。需要在项目申报的制度设计中设置申报主体平衡约束的具体要求,鼓励出版机构与学者个体、高校单位的对等合作,赋予双方同等的项目运作管理权,也可增加更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或约束性条款,规范学术出版走出去项目中的责任与利益分配,从而发挥政策制度公信与社会资本的协调作用。例如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要类别之一,在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中具有与其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等重要的地位,针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鲁东大学外语学科加强学科建设,围绕服务国家“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了多语种中华典籍与当代学术外译团队,构建起了本领域特色鲜明的学术高地,取得了系列重要学术成果,近3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5项。此外,考虑到社科学术图书外译过程中跨语境学术译介的现实难度,往往需要目标国母语译者与国内译者共同合作翻译,因此可以适当在制度设计时向海外汉学家和译者开放申请资助,以调动海外汉学家和译

者积极性,延伸中国学术外译的资助链条。最后,建立资助政策的体系化、层次性通道,例如除国家官方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外,中国人民大学还配套有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外译项目,已经签约和出版学术著作近170种^⑩。在此基础上,可打通不同内部体系资助政策的申请互通与双方互认,比如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可以申请浙江大学外译项目,形成制度协同。

4.3 结构资本整合:平台搭建与资源要素的共享

结构资本整合的目的是将合作网络中行动者主体的互动与协作常态化为一种流程化惯例。通过建立面向网络群体内部的信息共享、资源关联和有效沟通的平台设施,减少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效率。海外学术出版市场的主要渠道被大型国际学术出版集团垄断,学术出版若不与这些出版机构合作,其推出的学术出版产品就难以进入目标国的主流传播渠道,如海外主要的大学图书馆和高校科研单位。因此,整合结构资本,形成平台性的共享资源网络格外重要。例如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设立的“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2009年改名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发起单位,将自身积累的国际出版资源与国内外出版界共享,合作体成员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享合作体中的国际出版合作机构资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为使国内外学术出版机构能有充分交流互动的平台,自2013年开始定期举办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为学术出版同仁提供信息交流与经验分享的平台^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积累了丰富的与国际知名出版社对接的经验,形成了完善的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流程规范,通过将国际合作实践转化为结构资本,辐射整个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合作网络。社会资本的生成与演变是一个逐渐积累的动态过程,在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属性和特征,合作网络中的行动者主体从嵌入的网络中获取和调配资源,整合各类资本,可以有效提升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整体效能。

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是实现本国文化知识、思想观念跨国流动的重要载体,学术图书所附着的学术交流无国界属性使其在国际传播体系构建与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具有超越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障碍的

显著优势与溢出效应,成为影响文化他者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结构性力量。上述研究揭示的关系资本、认知资本和结构资本并非相互独立、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影响、互相转化的。在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过程中,伴随着行动者主体的加入与退出、关系的缔结与重构,三类社会资本对于整体社会资本的贡献也伴随着合作网络演化此消彼长,体现出合作网络结构中社会资本的流动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合作网络演化过程中出版机构、出版人、编辑等组织和群体在跨文化学术交流与理论旅行中的主体性建构作用,提高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组织形式、合作结构的多样性和适切性。

注释:

①白中林.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与世界思想格局重塑[J].出版广角,2019(4):30-33

②⑤⑩姜春洁.中华学术外译的社会资本分析(2010-2019)[J].外语研究,2021,38(1):85-90

③李雪涛.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几点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4,12(1):1-4

④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2): 242-266

⑥马玉梅.中国学术著作海外传播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J].上海翻译,2019(5):64-67

⑦李娜娜,张宝建.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社会资本的理論诠释与未来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5):11-18

⑧“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优秀案例人大社:“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绘就国际学术出版新篇章[EB/OL].[2020-11-30]. https://mp.weixin.qq.com/s/KVn3Sc_r8x7zhHQo80YfA

⑨吕秋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助力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基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2020年的统计分析[J].出版参考,2021(11):26-32

⑩学术出版走出去,还需爬坡过坎[EB/OL].[2019-04-22]. <https://m.gmw.cn/baijia/2019-04/22/32761639.html>

⑪“独树一帜”的人大社,如何备受海外市场青睐?[EB/OL].[2021-10-28]. <https://mp.weixin.qq.com/s/7Y7Kklp-wEli37IX0tO1Aw>

⑫刘海涛.学术出版“走出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53